

最后夜车



香港 台湾 与海外华文文学丛书

最后夜車

李 黎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解不开的“中国情意结”

李子云

不知读者是否还记得，李黎的第一本小说集《西江月》，不是出版于台湾或香港，而是在1980年由北京初版的。对于海外华文作家，这是唯一的例外。据我所知，在此之前，在大陆只出版过一本聂华苓的短篇集《台湾轶事》。这个集子是聂华苓在台湾出版过的短篇小说集的选本。《西江月》是大陆出版的第二本海外作家小说集，初版十万册，很快销售一空，并引起大陆文学界的注意。

收在《西江月》中的小说，在艺术水平上并不十分整齐。有的篇章文笔老到，个别的则显得不够成熟。不过，通体读来，却使人感到一种惊喜之情。这倒不是由于读者从中可以得到什么新奇的东西，而是这些小说的内容和作者所流露出来的思想感情，竟让我们觉得如此熟悉与亲切。《西江月》中所收各篇，绝大部分是以台湾现实生活为背景的，涉及台湾乡村大、中学校，知识分子家庭，以及关押仁人志士的监狱。尽管大陆、台湾相互隔绝三十年，从她所描写的内容，我们仍旧可以分明地看到在它们与1949年以前的历史之间所存在的那种血肉

相联的衔接关系。在写法上，作者又直接继承了五四以来“忧国伤时”、“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传统。对于那些为了个人名位而在是非面前缄默不言的学人教授，作者流露出一片悲悯之情；对于那个当年祸国殃民、践踏百姓、十恶不赦的“天王”的凄惨下场，作者报之以极端的嫌恶与蔑视；对于为争取自由与民主而献出了生命的烈士，作者则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其崇敬之情。《西江月》出版后，我曾写过一篇评论文字，将全书题旨归之为“在欺罔与谎言中寻求真理”。这一题旨与当时大陆盛行的“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化”——以弄清刚刚结束的那场历史大灾难的真相和探究其成因为主旨的文学，在精神上有其相似之处。从这一角度来讲，这本反映台湾生活的小说集使大陆读者具有一种毫不陌生的亲切感。

时隔八年，李黎的第二本小说集《最后夜车》又将在大陆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

这八年来，大陆对于台湾、海外文学的介绍有了很大的进展。在一段时期内，可以说是出现了台湾文学热、海外华文文学热。且不论在通俗文学领域中先后兴起的武侠小说热、琼瑶热、三毛热等等，就以台湾严肃文学而言，也几乎是从现代主义作品开始直到乡土文学、以至八十年代的无法以什么派来概括的各派小说同时涌进。旧作新著，荟为一时之盛。而其中印行最广的大概是女作家们的作品。

在众多的台湾、海外女作家的作品中，李黎的新作《最后夜车》仍显得独立不群。

总的来讲，近年来台湾女作家的作品，从取材到立意都有日趋狭窄的倾向。在五、六十年代，台湾女作家的小说，或表

现了旧式家庭中的妇女在封建礼教压迫下的悲惨命运，或表现了自我意识开始觉醒的知识妇女为争取独立自主地位而进行的艰苦奋斗。大部分小说的内容与正在变动的社会都有密切的关联。从六十年代末开始，台湾由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型，家庭结构、道德规范、价值体系随之发生急速变化。这些变化在女作家笔下得到相当出色的表现。她们不但与男作家并驾齐驱地向传统观念、规范、行为模式与思维模式提出怀疑，还表现了长期处于受压抑状态的女性在这种令人目眩神迷的突变中所产生的惊惶失措、甚至精神失常的现象。然而，到了七十年代末期，台湾女作家作品的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作品中所体现的那种反抗旧的传统、顺应新的社会变化、寻求自我价值、要求人格独立的精神逐渐减弱，大量出现的是向商业社会妥协、成为物质欲望奴隶的那类妇女的所谓恋爱故事。不少畅销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十分开放的女性。在爱情、婚姻方面，当然也都有了自主权。但是，她们并没有因此而摆脱对于男子的人身依附，只是在买卖的方式上，从由父母做主的“被卖”过渡到了“自卖”而已。这种“爱情”小说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蒋晓云的作品为代表。在蒋晓云的作品中，女主人公在婚姻的选择上已经摆脱了任何感情因素的作用，她们唯一考虑的是如何从婚姻契约中获得更大的利益。台湾有作家将这类妇女称之为“无情的一代”，我以为这讲法很贴切。她们根据学历、经济能力以及社会地位等条件取舍“男友”，在感情上已经达到了绝对冷静与无动于衷的地步。第二类更为流行的题材则是婚外恋、外室风波。从苏伟民的《陪你一段》这类书名就可猜度其内容之一斑。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自愿充当情妇、屈居外室的妇女，大多是经济上完全

独立的女性。当然，如果通过这类题材，能够深入揭示出生产这类社会现象的社会的、传统习惯的、以及这些人物的心理方面的原因，也可以写出动人心魄的作品。可惜的是，在这类作品中，作者大多仅仅停留于表现纠缠不休的男欢女爱。这就使它们逐步向通俗言情小说靠拢。

李黎的收于《最后夜车》中的小说，则远离这类男欢女爱的内容。按照陈映真的说法，和在《西江月》中一样，李黎在这个集子的作品中，仍然是“通过小说的形式来思考个人与整个祖国和民族的去路”。当然，这两本小说写成的时间相距较远，同时，作品题材所反映的时空背景也不相同。特别是作品所呈现的风格有了很大的变化，由热情蓬勃转向了沉郁。

李黎创作风格所以发生转变，我想是由于收在这两本集子中的小说正好写于“保钓运动”的期间和挫败之后。李黎是参加“保钓运动”的过来人。对于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发生于北美的反越战和华人范围内的“保钓运动”，和几乎同时发生于西欧的“五月风暴”一样，其间的功过得失，似乎还没有人能够为其做出全面的评价。然而，这些运动对于欧美知识界所发生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它们促使知识分子对于政治问题及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进行认真的思考。“保钓运动”则在这些之外，还带有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的色彩，即由保卫钓鱼台群岛主权开始，然后发展到提出祖国统一的口号。李黎是在七十年代初期“保钓运动”还处于轰轰烈烈的阶段来到美国，而且立即积极投身于这场运动的。《西江月》里面的大部分作品所反映的正是作者初到美国那一阶段的精神状态。由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在台湾都属于禁书，和早她十年来到美国的

那一代台湾作家一样，她也是到美国后才大量接触到这些作品的。她从中首先承继了新文学中关心社会、关心人生、为人民代言的传统。加上“保钓运动”所发扬的理想主义精神和激进主义情绪的感染，于是，在这个浪潮中她所写下的回顾在台湾的生活的作品就带有鲜明的批判台湾社会弊端的色彩，而将疗救社会的希望寄托于海峡彼岸的大陆。这种政治倾向不仅体现于《谭教授的一天》、以陈天王为主人公的《西江月》和描写牺牲于台湾监狱的仁人志士的《童年》、《阿宽》之中，在集子的最后一篇《天凉好个秋》中则表现得更为直接。在这篇小说中，她以大陆学者为主角，将这位来美访问的大陆学者与留美学人做了对比。尽管在那场席卷大陆的浩劫中，这位大陆学者历尽折磨，家破人亡，但他仍然精神矍铄，壮志未已。他那位早年来美的同窗，虽已拥有足以颐养天年的宽裕的物质条件，但已心如枯木，精神上无所寄托。两者之间的对比，无须笔者再加分析，读者已可一目了然。在作者心目中，尽管那场“革命”失误甚多，但是，这并未能动摇她认为人类的理想与希望仍在那块土地上的信心。

可以说《天凉好个秋》既是李黎创作上承前启后之作，也可以说它是李黎创作过程中的一个分水岭。

所以说它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是因为以《天凉好个秋》为开端，李黎取材的范围不仅开始转向台湾、留美和大陆三方面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他们的心理状态，而且《最后夜车》的各篇几乎全部集中于这一类题材。

说《天凉好个秋》是李黎创作上一个分界线，则是因为它与《最后夜车》中取材虽同，在艺术处理和所体现的题旨方面

又不相同，《最后夜车》中那些由台湾到美国的主人公们，逐渐失去了视大陆故土为理想彼岸的信息，再度出现思想上的困惑，和徘徊于两个故乡——大陆和台湾——与异乡美国之间无所依归的失落感。作品的基调由明朗转向沉郁。这一转变的发生，我想是由于“保钓运动”在遭受挫折之后开始走向低潮，失败的种种原因去除了她的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在这期间，李黎本人又多次回到大陆，对于那场所谓“文化大革命”的后果进行了实地考察，发现了在那些欺骗性的宣传的背后存在的真相。她视为理想净土的地方，不仅贫穷、落后，而且也存在种种不公正、不合理的状况。她感到难言的失望。加上几年来在美国家庭的建立、事业的发展，特别是自己的丈夫所学的专业与国内落后的科研条件之间存在着巨大矛盾。这对于她实现回归祖国的愿望更增添了实际的困难。作者热爱祖国、关心民族命运，却又感到有家难归。在这种心情的支配下，《最后夜车》的总主题自然就转到了表现自我放逐于海外的游子的复杂矛盾的心理状态。她为台湾版《最后夜车》所写的题为《中国结》的自序，也许可以帮助读者更为准确地理解她在创作中的这种心情。她说：离开台湾十多年之后重返台北的一个晚上，在冷落而显得陌生的街上：

“忽然，三个特别明亮的字板撞进我的眼睑。

——‘中国结’。

“一刹那间满街灯火好似都黯淡下来，只有那么三个白底大红字，清清楚楚的紧立在我眼前，——‘中国结’三个字在那一刹那有了另外一层意思，成了另一个名词，一个我一直找寻的、一个足以形容一些事物、一些状态的名

词——一种吊丧的、痛楚的挣扎——一个心头的结。

“这个无形的结，无形而几乎无所不在的，缠结着中国历史的光荣与耻辱、分裂的凄惨与痛苦、骨肉相残的悲哀、自我流放的无奈……

“有人把中国人独有的那份矛盾与苦难称为中国人的十字架；我却觉得：用一个外在的、强加的重压做象征，不好用一种内里的、能生根滋长的情结作形容。”

表现纠缠于海外华人心底的“中国情意结”，可以说是对于这本小说集总主题的最简约的概括。这个情结贯串全集的始终。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不仅并未淡化，反而愈并变得强烈而执着了。从《近乡》至《开封城的犹太人》，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结愈益抽紧的过程。

随着作品的内容与主题的改变，李黎在《最后夜车》中所采用的表现方法上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她逐步摆脱了由于直接继承三十年代传统衍化而来的叙述方法，而调动了各种不同的表现手段。有时通篇小说都在表现某一人物的心理过程；有时则表现某一人物在某一段特定时间内，由于受外界事物的触动，所引发的心理反应；也有通过人物之间的对话与动作来进行客观描写的。在她运用不同表现手法的同时，在写法上又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发挥了象征的作用，特别是总体象征的作用。好几篇小说的题目直接点出了小说所包含的象征意义。《失去的龙》这样的题目，自不必说，而如《春望》、

《近乡》、《最后夜车》、《开封城的犹太人》等题目，乍一看来，似乎与“中国情意结”没有什么明显的关联，但读罢作品后，就可感到这些题目其实都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

《春望》望的是早春开冻，以便隔海相望三十多年的父子可以跨海相聚。然而，作者在处理这个题材时，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虽可相见却没有可以团聚了。近四十年的隔绝已在彼此之间设下了重重障碍。台湾的父亲已经另有所娶。与其他同类题材小说不同之处在于，李黎让这位父亲收养了一对死于台湾监狱的烈士的子女，并通过这个义子从中架起桥梁，使得海峡两岸的父子得以见面。这个情节，不仅再次体现了李黎创作上的一贯倾向，而且极其沉重地表现了几代烈士以生命来争取春临祖国大地的心情。

《最后夜车》实写的是一个在“文革”中造过别人的反、而自己的家庭又毁于另外的“红卫兵”的“革命行动”的年轻人，在美国死于非命的事件。打工下班后再去读夜校，待回家时已是午夜了。在乘客稀少的地铁车站上，为了保护一位来自大陆的女学者，他被一个黑人杀死了。小说所着意表现的，并不是这个年轻人的肉体毁灭的过程，而是通过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的思想活动，表现了他精神上走向绝路的过程。有关“文革”的痛苦记忆梦魇般纠缠不去，唯一能够给予他以同情和慰藉的台湾女同学又为生计离他而去，使他在所依托的精神濒于崩溃。舍身救护女学者的行为既体现了他对大陆同胞的热爱之情，也许还包含了寻求最后解脱苦闷途径的意念。这个挣不断的“中国结”一直缠绕到他生命的最后。“最后夜车”既是他的肉体走向毁灭，也是他心灵走向毁灭的最后班车。

《近乡》所选取的题材更为普通常见了。海外游子返大陆探亲，这是八十年代初海外作家笔下的时髦题材。但是，李黎处理得与他们不同，她表现的不是亲人首次会面时的“相见欢”或“相见悲”，而是第一次归来的留美学人近乡情怯的复杂

心理。离乡渐近，尘封已久的童年往事和多年以来在异国他乡所感受的孤单寂寞，一齐涌上心头。他在美虽已经娶妻生子，但妻子儿女都已彻底美国化，彼此之间很难进行思想感情的交流。在偶然的机缘中，他遇到一位能理解他的台湾女生，然而，惊鸿一瞥，她随即回了台湾。在大陆的姑母、表姐、妻子、儿女和台湾女孩之间，又结成了一个复杂的感情的网。而且，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又无不与家国之情相联系。这篇小说最见特色之处在于结尾，给人一种回峰突转的感觉。当他即将进入日夜思念的故乡时，他越来越强烈地感到的不是即将与亲人会面的兴奋与快乐，反而是一种畏惧之情。姑妈、表姐与妻子儿女是否能够互相接纳？他自己与她们是否会变得疏远陌生？他开始为此感到惴惴不安。在这里，李黎表达了身处异域、却又与祖国逐步疏离的一种“边缘人”的悲哀。

在李黎所作这类题材的小说，留美著名女作家欧阳子最为推崇的是《失去的龙》。她以为这是一篇“艺术形式完美，内容题旨引人深省”、“至为罕见的精彩杰作”。小说表现的是夫妻离异所带给孩子的灾难。欧阳子针对被父母双方争夺不已的孩子所处的两难境地提出了“人性的救赎”的问题。家庭影响必将影响子女思想感情的健康发展，这是小说在表层上所提供的意义。它的深层意义、它所象征的则是国家未得统一的状况带给某些海外知识分子的困境。这两层题旨，都是通过父亲和九岁儿子的对话表达出来的。那是轮到父亲接儿子出来相聚的一个下午，就在父亲陪儿子玩电子游戏、逛恐龙博物馆、吃汉堡包过程中，父子之间所进行的琐琐碎碎的谈话间，让读者逐步了解夫妻不和的原因和孩子夹在当中无所适从的心情。导致婚姻破裂的原因，除去妻子不满于丈夫埋首科学研究而忽略

家庭生活之外，还暗示出其中夹杂着“台湾叔叔”介入的因素。及至父亲提出夏天将去大陆讲学，希望儿子同行的时候，又明显地暴露出父母双方在工作、亲属关系及感情倾向方面所形成的差异。于是，一个普通的婚变故事又与“中国情意结”联系了起来。请看这一段对话：听到去大陆，孩子开始“眼睛一亮”，但想到妈妈在暑假要带他去台湾看外公外婆，就“慢慢收起了他的兴奋。”爸爸很失望，说：那么，“爸爸一个夏天都看不到你了？”“可是，如果我跟你去大陆，妈妈也会一个夏天都看不见我了！”“妈妈！妈妈！我一点都没说错，你还是站在妈妈那一边！”孩子注视父亲半晌，眼圈慢慢红了。他低下头，轻轻地说：“爸爸，孤儿院收不收我这样的小孩子？……我是想，如果我哪边都不住，就住到孤儿院去，那——那你跟妈妈哪个也不会怪我站在那个一边了，是不是？”不必再加分析，读者即可感受到李黎在这里是借孩子之口直接抒发自我放逐者心中的悲哀了。欧阳子所提出的“人性的救赎”，正是既针对夹挤于交战的父母之间的不知所措的孩子，同时针对在海峡两岸和海外都找不到依藉的“边缘人”。这确是一篇内涵深厚、思想容量很大的作品。只是，我觉得，这篇小说围绕着“中国情意结”这一题旨，在结构上安排得过于严谨熨贴，几乎无一处废笔，因而让读者感觉到雕琢过细的痕迹。父子二人的对话过分集中于这个话题。在环境的选择（机器人交战的电子游戏场、恐龙博物馆）、陪衬性人物的配置（在游戏场遇到的女秘书也是离了婚带儿子来度周末的）等方面，也都意向性过强。这样写来，既有失自然，又给人一种过分沉重的感觉。

我以为在李黎表现这类主题的小说中，艺术上最为成功的

当属《开封城的犹太人》。尽管在这篇小说中李黎仍然将主人公置于台湾、美国、大陆的三角关系之间，但是，与其他各篇相比，这篇小说更重形象、重感情色彩、将题旨隐于形象之内，消除了李黎有些小说中所存在的理念过于明显有损感性形象的弱点。这是她第一篇正面处理爱情、婚姻题材的小说。在这篇小说中，她不再是以爱情、婚姻事件为媒介、为载体，明显地令人觉得意在言外。在这里，她实实在在地表现了一个要求自立而又需要男性温情的妇女在感情方面的坎坷经历。对于女主人公第一次婚姻的破裂、第二次没有结果的爱情，和即将举行的第二次婚礼，作者却表现得收放自如、抒发充分。她仍未取平铺直叙的手法，而将女主人公的这些感受集中于婚礼即将开始的短短的时间内，通过意识的流动予以表现的。从她换上小礼物到戴项练的过程中，她断断续续地回忆起初恋、第一次婚姻、婚后争吵直至几乎自杀的镜头。这段回忆中最精彩之处是离婚后两人在台北偶遇的场面。那位功成业就志得意满的学人在她眼里显得那么平庸猥琐。读者读来也会为她早日从这场婚姻中解脱出来感到庆幸。在她进行面部化装的时候，她拒绝涂红色的唇膏。因为她爱过的那位大陆学者不喜欢她涂唇膏，由此又勾起了她对大陆学者的回忆。虽则两情契合，他为他的气质所深深吸引，但他不能不如期归国，何况他在国内已经成家。这段感情似乎始终在她心头徘徊不去。就在婚礼即将开始的时候，她还想起大陆学者讲过的一件事：开封城是五百年前犹太人移民远东的第一个城市。近百年来，这支移民的文化传统已渐次湮没，为当地的回族所同化。至于这位有着回族血统的学者是不是犹太人的后裔，连他本人也无从查考了。为什么在她即将与犹太人结婚的时候突然会想起这件

事？作者未加任何解说。但读者可以体会到，也许正是由于她对“开封城的犹太人”的后裔的思恋，促使她接受了美国的犹太人的爱情。同时，在她落籍犹太人的时候，她又隐隐感觉到“开封城的犹太人”的今天的命运将是她（也是大多数海外华人）未来的命运。这里又导向了海外游子的归属与文化认同的问题。——她在这次婚礼中，已经全部遵从了犹太教的仪式，这不是已经开始向犹太文化靠拢？这篇小说优胜之处就在于它真正深入地展示了这位妇女在爱情与婚姻问题上所面对的种种矛盾、所受到的挫折与打击、和感情上所经受的痛苦。而关于海外知识分子的归属和文化认同的题旨，则是通过她的经历而自然而然地引发出来，需要读者仔细加以体会才能感受到的。这就避免了作品感性的描述不够丰满而理性色彩过重的弊病。

李黎是一位有思想、有才华的女作家。她的大部分作品具有深度，并且具有深厚的历史感。她近年发表的小说在台湾几乎都引起了相当强烈的反应（除《失去的龙》得到欧阳子很高评价之外，《最后夜车》则曾获得1982年度的《时报》短篇小说奖）。它们在大陆刊出时，却没有产生相同的效果。其原因，我以为第一在于大陆读者方面。这几年大陆文学无论在题材内容方面，还是在技巧方面，都不断地在竞奇斗巧。许多年轻读者也热衷于花样翻新的作品。许多题材流行一时后很快就成为过去。其结果，许多读者对于某些题材不新但蕴含新意的作品，失去了细细咀嚼加以品味的耐心。以海外同胞思乡、探亲为题材的小说，也是在风靡一时之后，很快丧失了对于读者的吸引力。对于后来出现的这类作品，尽管其含意比较深刻，反应冷淡就也不足为奇了。对于长期处于封闭状况、只能读到极

其单调作品的读者来说，出现某种浮躁情绪，也许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然而，如果这种状况持续过久，也会出现破坏读者鉴赏水平的危险。这是属于读者方面的原因。另一原因则是，从李黎近期作品来说，题材过于集中一个方面。尽管她在每一篇中，都力求寻找不同的表现角度，在思想意义方面也不断进行更深入的开掘，但毕竟在题材上有嫌单一，连续读来不免令人发生疲劳之感。在此，作为李黎作品的热心读者，我向李黎提出一个期望，希望她就此告别、或暂时告别“中国情意结”，将目光投向一个新的领域。

1988.2.28.

• 1986年台湾首次印行李黎小说集，书名也是《最后夜车》，但所收篇目与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这本不同，前者是她二十年来所发表的小说的选本，后者则是继《西江月》之后所写小说的结集。

目 录

解不开的“中国情意结” 李子云

最后夜车 (1)

失去的龙 (24)

春 望 (42)

开封城的犹太人 (54)

天堂鸟花 (83)

近 乡 (103)

大 典 (133)

漂泊者 (149)

最后夜车

一班地下车空，车厢后方角落里那个单独靠窗的座位多半是他。他每回上了车总是习惯性地朝那里走去。若是那个座位有人占了，便只得胡乱在面对面的两排长椅坐下，看窗外得空就走开去，脖子痠了转回来，又得碰上对过一排乘客空洞的视线。视线不安地朝上移，却还是那几张广告：万宝路香烟、贺驰租车公司、七喜汽水……满面欢容的男男女女，活泼地露着雪白的牙齿笑在墙上，象是才钉上去的还有微温的活字本。倒是底下不无表情的乘客更象凝固已久的图象，令人觉得十分的不对，尤其在这近午夜的时刻，极明亮的车厢里稀稀疏疏的几个人，更是不对得令人不安。

坐车的时间几乎是他一天唯一可以安安静静休息的时刻，所以他更珍惜角落里单独的座位。尤其是今天，黄珏来了信。虽然只是一张明信片，虽然他一个晚上已经找机会把那寥寥几行字读了好几次，却还是在盼着这半小时的车程，他可以安安静静地读她的话，象在跟她谈心。同时他也需要好好地休息。今天他的头痛又发作了一次。

自从从美国以后，他白天一向在三姨的礼品店里搬货、打杂。这阵子三姨看他的英文和记帐都可以对付了，放心留他单